



他们 都是领袖

THE JOURNEY OF BEIJING OPERA:
STORIES OF PUBLIC DIPLOMACY

我的公共外交实践

◎ 孙萍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013027536

G115-53
06

他们 都是领袖

THE JOURNEY OF BEIJING OPERA:
STORIES OF PUBLIC DIPLOMACY

我的公共外交实践

◎ 孙萍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航

G115-J3
06
C163689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们, 都是领袖 / 孙萍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034-3538-6

I. ①他… II. ①孙… III. 文化-世界-文集 IV. ①G112.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2730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封面设计: 万有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8.75 字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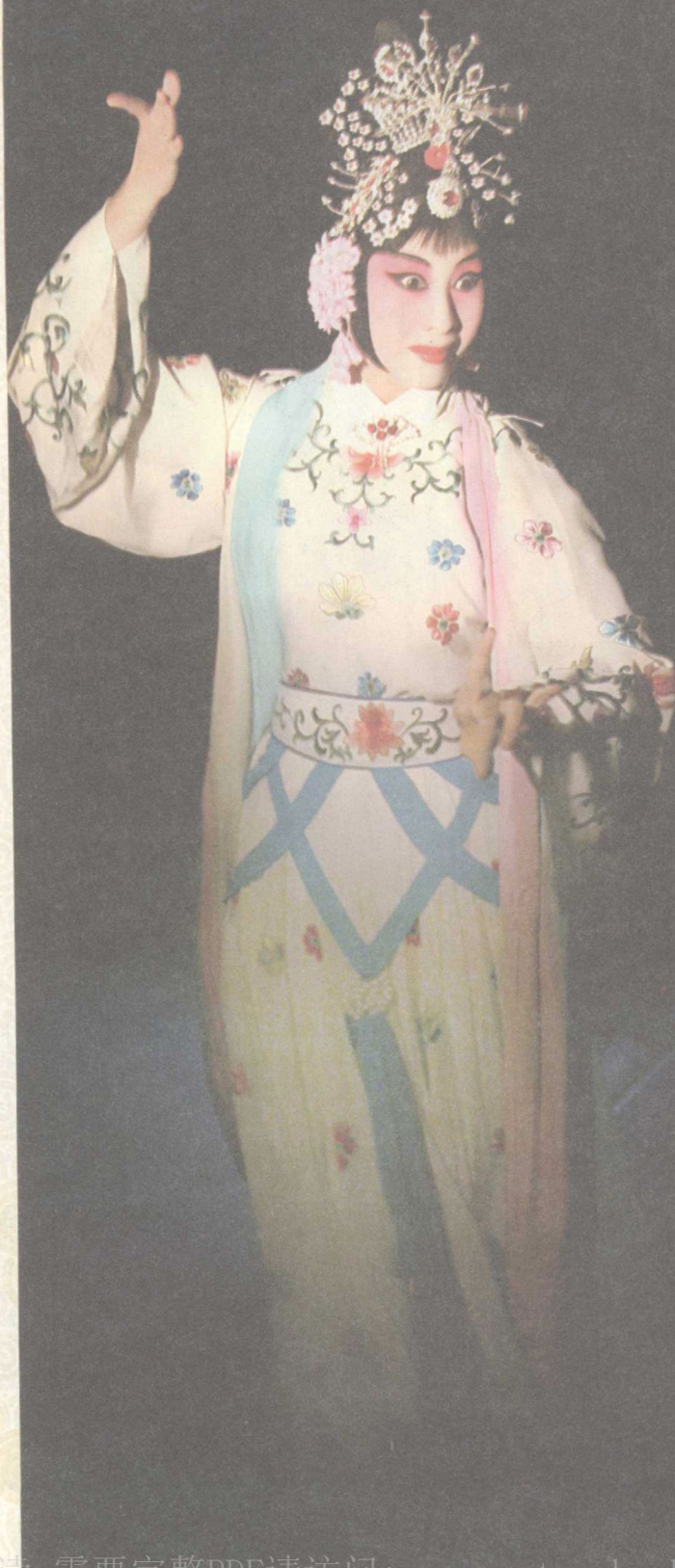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穆桂英挂帅》

孙萍饰演穆桂英



《天女散花》

孙萍饰演天女



《霸王别姬》

孙萍饰演虞姬

《贵妃醉酒》

孙萍饰演杨贵妃



序

赵启正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但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在近代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有多少，就难以回答，大家的感觉是比我们应当的贡献要少得多。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世界第二，出口是世界第一，但是它的文化出口，也即它的文化影响力却排名靠后^①，国际舆论也在问它真的崛起了吗？一个国家的经济强大只是崛起的必要条件，只有加上文化的强大才算全面崛起了。世界各国都在发展中，若想成为一个被尊重的国家，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它的文化被世界喜欢，而不是先看有多少军力，国民生产总值有多少。往往军力越大，别国越会有警惕；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别国越会有嫉心。小国受到尊重的例子也很多，这样的国家必然是因为文化灿烂才被人尊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雄厚，现代文化也在发展中，哪些文化能走出去？如何走出去？以什么方式走出去？这是我们国人，尤其是文化人必须回答和

实践的问题。

有一句关于文化传播的话流行了很久——“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这句话是需要推敲的，这句话会使我们懒惰。我们不努力，我们的文化也会自动地成为世界的吗？这怎么可能呢！比如，地方的某一种表演艺术，它是地方的，当然也是民族的，但如果中国都没走全，怎就会成为世界的呢？有人说这是鲁迅说的，其实，鲁迅并没有这样说过。鲁迅是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综合鲁迅当年说此话的语境，我的理解是，只有在本民族是优秀的和能为外国理解的文化，加上主动走出去，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的。

本书作者孙萍本来是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她没把自己囿于京剧舞台，而早在1990年就走出了国门，在匈牙利、德国、美国等国从事京剧的理论和表演的传播，同时她还擅长把京剧要素融于外国戏剧之内，成功的创意赢得了外国戏剧家的膺服。在国外的十几年，她直接向当时的匈牙利总统根茨·阿尔帕德、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克林顿和德国前总统科尔等领袖人物讲解了中国文化，还和一些国家的戏剧界领军人物在文化合作中结下了深厚友谊。

公共外交的概念是近五年才在中国传播开的，由公众承担的文化对外传播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在这一任期内把推动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作为履职的一个新领域和工作主线，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

动——举办讲座、开展国际交流、出版公共外交刊物和专著。孙萍是外事委员会的委员，也是该委员会内的公共外交小组的成员，是公共外交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我很高兴，孙萍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出版了这本属于推广公共外交之列的新著。她在国外的十几年中，似乎往往是“单枪匹马”地展开着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内涵的公共外交活动，但她毫不孤独，她身后的支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此书的题材多少有些“奇异”，故事自然也十分有趣，我相信它必将受到对公共外交有兴趣和爱好京剧的读者的欢迎。

①：英国《单片眼镜》(Monocle)杂志在2012年11月18日公布的世界软实力排行榜调显示，排在前五名的国家是英、美、德、法和瑞典，其中国为第22名。文化的输出是评价软实力的主要根据之一。当然，也要注意不同的调查体系会影响排名顺序。

前 言

我是一个京剧演员，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我为京剧而生”，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自白。

我出生在宁夏，父母都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北京来到西北支宁的医生。西北的艰苦生活，磨砺并造就了我坚强的个性。西北虽然苦寒，但身处父母羽翼护佑之下，童年的生活却也不乏欢乐。然而，在我 10 岁那年，母亲不幸去世。身处异乡，外加年幼丧母，仿佛整个世界瞬间崩塌。

丧母之痛使我心碎，但生活之艰却容不得我多想。哭过之后，我只能擦干眼泪强迫自己从悲痛中走出来，在磨砺中成长壮大。十一岁那年，因为我的文艺特长，被老师选中进入宁夏京剧团学员班，从此与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别人看来，我的艺术道路可谓一帆风顺。1975 年，15 岁的我就凭借现代京剧《赛驼之后》在全国戏剧汇演中获 3 项大

奖，一举成名，一时间可谓“家喻户晓”。但这一时华丽之后的艰辛却只有我能体会。

看过电影《霸王别姬》的人，一定会记得师傅教徒弟练功时的狠话：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很多人看过之后难免唏嘘感慨，最后一叹了之。但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我，这句话却直戳我的痛处，因为我深知学戏之苦。学戏的时候，我比谁都用功，起早贪黑，没日没夜。所有这些，只因为我固执地相信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一举成名之后，我本以为自己会以一个“角”的身份，在京剧舞台上走完一生。但个人命运往往与历史大背景暗合，而且个体毫无抗拒之力。我的出生如此，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也是如此。1977年，因文革冲击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恢复，我当时虽然已小有名气，但一时的成功却并不能抹去我心中的忧虑：我深知作为京剧演员，一个人的艺术生命毕竟有限；而只有将个人有限的艺术生命植根于知识的沃土，艺术之树才能常青。权衡再三，我决定暂时放弃舞台演出，去考大学。

1978年，我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有幸成为中国京剧史上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而这一年，我尚未满18岁。

如果说踏上京剧舞台大大丰富了我原本单薄的生命个体，那么进入中国戏曲学院继续深造则开启了我戏曲生涯的新篇章，为我以后的戏曲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我已入行多年且

在业内小有名气，但是中国戏曲学院特有的艺术氛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却着实使我获益良多。当时的戏曲学院可谓群星闪耀，大师云集，梅葆玖、史若虚、王玉荣、王晓荣、李维康等前辈悉数在列。春雨有情，润物无声，大师们给予我的，不仅仅是专业上的指导，更是道德和人格上的熏陶。跟着他们学戏，不仅仅使我表演水平大大提高，更使我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在大学期间，我虚心向前辈求教，认真钻研理论知识，在史若虚院长和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艾美君、杜近芳、张君秋等前辈的精心栽培下，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学习之余，我还撰写有关戏剧方面的理论文章，被艺术界老前辈称为“知识型京剧演员”。

回想戏曲学院的生活，我最为怀念和感激的人，是当时戏曲学院院长史若虚先生。史先生才华横溢，德艺双馨。正是他的精心栽培和悉心照料，使得我在京剧艺术之路上走得更为轻松，也更为坚定。

由于在校期间表现优异，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家京剧院工作。当时的京剧院亦是人才济济，名家云集。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凭着自身努力成为了京剧院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并很快在重要剧目中担当主要角色。我非常珍惜京剧院的工作，它使得“初出茅庐”的我就有机会和袁世海、李和增、吴玉章等大师同台演出。作为后生晚辈，我心中的惶恐和激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大师们虽成名已久，却丝毫没有我想象中

大师会有的“架子”，对我这个刚毕业不久的“小孩儿”也是关爱有加。与他们相处，我感受到最多的是他们长辈般的慈爱，以及他们对于京剧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也是中国京剧最后的一批“遗老”，他们从老戏班上带来的“做戏”和“做人”的道理使我感动，更使我受益终生。正是这些“老戏骨”的关爱提携、言传身授，使我得以在艺术之途攀上新的高峰。

另一个对我戏曲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便是我的先生叶金森。先生出身于梨园世家，曾祖父率徽班进京，乃有京剧之滥觞。祖父叶春善创办“富连成科班”，开京剧教育之先河，并培养了梅兰芳等京剧大家。先生得到其叔父、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盛章的真传，技艺超群，唱、念、做、打无所不精，尤其擅长武生和丑生。作为一个京剧演员，能结识先生并嫁入梨园世家，成为一个传统犹存的艺术世家的一员，除在京剧技艺方面获得直接营养之外，更多的是在家庭氛围上得到潜移默化的滋润，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但作为这个家庭的儿媳妇，我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要做的，不仅仅是相夫教子，更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这原本辉煌灿烂的家史添上自己的一笔。

我热爱京剧，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便爱得越深，深到难以自拔。可是正当我在京剧道路上奋步前行的时候，老天却和我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正是这个玩笑，使我看到了京剧的另一种可能。

1990年，应中国剧协邀请来访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室内剧院院长米克洛什·须茨先生和艺术总监奇思马迪阿·蒂博尔先生偶然看了我的演出，对我的表演赞不绝口，并深深地为京剧这一中国古老的艺术形式所折服。之后不久，我收到了匈牙利发来的邀请函，邀请先生和我共赴匈牙利进行文化交流，这正是将京剧这一古老的中国艺术推向世界的绝好时机。顺理成章，我夫妇二人受文化部及中国京剧院委派前往匈牙利交流学习。

到达匈牙利后不久，恰逢我国国庆，我们受邀参加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国庆宴会。未曾想，时任匈牙利总统的根茨·阿尔帕德竟然不请而来，我有幸与他交谈并被邀请择日会面，一来二去，我们便成了好朋友。正是因为我的艺术家身份，使得我受到总统先生的青睐，并最终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95年，我受中国驻匈牙利大使的委托，向总统转达了希望他访问中国的意图，并最终促成了当年的匈牙利总统访华，开启了中匈交往的新篇章。

鉴于我对中匈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1993年，我被匈牙利政府授予“匈牙利荣誉国民证章”。能获得如此荣誉固然令人欣喜，但更让我欣喜的是，匈牙利人民对于中国京剧和中国文化的接受，这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对普罗大众有着直接而深远的感染力，不论国家、民族、语言与肤色。正是这次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使我第一次真正领悟到艺术在国家交往中的力量 and 作用。从此，

作为艺术家的我与“外交”结下不解之缘。

此后，我又多次受邀出访匈牙利，后来又作为匈牙利裴多菲剧院的艺术顾问长期工作于斯。在匈牙利的9个春秋里，我一直致力于京剧在当地的推广工作，竭尽所能，利用艺术家身份建立的关系来推动中匈两国的文化交流，让中国人民了解匈牙利，也让匈牙利人民了解中国。

正是在与匈牙利艺术家的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了京剧与西方戏剧潜在的契合点：作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之一的“梅氏京剧体系”在表现形式和审美情趣上与欧洲的“动作戏剧”流派有着相通之处，都以形体动作来表现时空的转换和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但后者与京剧相比，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简约有余而美感不足。

这一发现使我欣喜若狂，作为一个京剧演员，我是多么希望看到京剧能与西方戏剧相互借鉴，并最终赢得西方观众认可。于是，我便开始与裴多菲剧院合作，寻找恰当的方式实现中国京剧与西方戏剧的适度“融合”。

1994年7月，我与裴多菲剧院合作制作的第一部动作戏剧《圣·拉兹洛国王》上演，该剧的特色在于其对中国戏曲的旋律、唱法以及京剧的表演程式、武打技巧等的吸收，演出大获成功。

第一次尝试即获成功使得我信心大增，也让我看到了中国京剧“扬帆出海”的可能。于是我们一鼓作气，相继排演了《西游记》、《艺术家的节日》、《中国姑娘图兰朵》等剧目，都

表现不俗。在1994年第10届国际动作戏剧汇演中，由我指导的《西游记》获得最佳编剧和最佳表演奖。时任德国总理科尔亲自颁奖并发表讲话说：“非常感谢两位中国艺术家（指我和我的先生叶金森），你们给欧洲这几种死板的戏剧艺术吹进了一股新风。动作戏剧是中西方艺术结合的典范，并且这种结合是成功的。”

多年的匈牙利生活我获益良多，在这里我收获的不仅仅是欧洲同行的认可，更是匈牙利人民的友好和热情。而正当我在匈牙利工作左右逢源之时，人生的又一次转折不期而至。

1998年，我拜会时任驻美大使的李肇星，与他探讨文化交流的问题。大使对我在欧洲的交流活动非常感兴趣，并推荐我去美国进行同样的尝试，将中国京剧和中国文化介绍给更多的美国人。那时我对在匈牙利工作和生活都很满意，所以不可能没有犹豫。但考虑再三，最终我还是决定接受大使的邀请。在短暂的考察之后，1999年，我正式调任美国。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中国外交工作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有幸为大使垂青，担当中美文化交流的“引路人”，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离开熟悉的环境，踏上新的路途，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爱国情怀却容不得我犹豫，只有抛开不安，迎难而上。最初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入美，到美之后，我便抓住一切机会，通过交流、演讲、授课等方式向包括艺术家、议员、大学生在内的各色美国人介绍